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0BJL029）资助项目

秦兴方 田珍 ◎著

县域经济发展的 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

THE DYNAMICAL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RULES OF THE COUNTRY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0BJL029）资助项目

秦兴方 田珍 ◎著

县域经济发展的 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

THE DYNAMICAL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RULES OF THE COUNTRY
ECONOMY DEVELOPMEN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 / 秦兴方,
田珍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141 - 8890 - 5

I. ①县… II. ①秦… ②田… III. ①县级经济 -
区域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916 号

责任编辑: 崔新艳

责任校对: 王肖楠

责任印制: 王世伟

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

秦兴方 田 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经管中心电话: 010 - 88191335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cxy@126.com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l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9.5 印张 350000 字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890 - 5 定价: 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com.cn)

序

中国古代就有“郡县治，而天下无不治”之说，这主要是指县制和县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稳定器”的功能。在当今中国，县制不仅是国家的“稳定器”，而且具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功能。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成为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重大实践课题，而且，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在空间上的主要集中地——县域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难点和重点，因此，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而且是热点问题之一。十五年来，从学界的研究选题来看，涉及县域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多，如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发展与农村城镇化、农户生产经营与农民富裕、农业发展及其现代化等，但将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系统进行研究并探寻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则不多。《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变迁规律》一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以县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国情和丰富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范畴和理论（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生产力与

生产方式理论、市场竞争理论、资本结（黏）合力理论、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试图通过对实践的科学、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提炼，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并在这一基础上找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研究思路，这一研究都有别于同类研究，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路子。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既需要理论工作者能立足于中国实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有全面、正确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又要能利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炼，这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同时，有多年在县域挂职锻炼担任副县（区）长的经历。这样的学习和实践经历，为高质量地完成本选题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成为作者开展本选题研究的独特优势。所以，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不是用纯粹的理论演绎或“理论—理论”的范式，也不是简单地用既有理论解释（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实践”范式，而是运用基于丰富的实践归纳、总结、抽象出新理论的“实践—理论”范式，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支撑的。这一研究范式，成为本书的重要特色和亮点之一。

基于中国国情、县情和深入的理论研究，作者就美国经济学家胡佛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理论具有不完全适用性，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县制和县域经济系统的特点，提出了县域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增长性、县域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包容性和县域再生产过程的有限市场性，回答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用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县域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石。其中，县域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增长性，决定了内部资源的集约利用与集中利用内外部资源是主要途径；县域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包容性，决定了县域经济必须走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县域再生产过程的有

限市场性，是由中国县域经济系统的特殊性决定的，它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形成及其结构的变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对于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县域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敢于质疑并结合中国实际创新理论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是值得肯定的，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闪光点。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学人纯粹用西方经济理论或方法来解释或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成为一种时髦，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那种基于高度抽象或严格假设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实际甚至严重脱离现实。例如，在论及解决中国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时，一些学者习惯于照搬刘易斯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农业的现代化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吸收以后，工业部门支持农业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实现的，也即：农业是被工业化带进现代化的。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对落后的农业和农村，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标志，创造了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的道路，也就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从实践效果来看，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水平确实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依靠非农发展所带动的“三农”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状况。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 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因此，我们必须下大气力补上农业现代化为代表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这块短板。由此可见，刘易斯模型确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照搬照抄这一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其路径就要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发展，将“三农”发展直接作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因此，我认为，本书勇于对西方区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并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县情的经济理论，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学者开

展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或方法，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值得肯定并借鉴。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转型发展是重要主题，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发展动力。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转型，实质上就是面临着转变发展动力及其结构这一重大任务。本书从 2010 年开始就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其结构问题，具有前瞻性和前沿性，而且得出了诸多独到性的研究结论。例如，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方面，本书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包括县域专用人力资本和通用人才资本流动的中国特点、县域居民消费力流动的中国特点、农户分化的中国特点，以及县域企业行为和县域政府行为的中国特点，等等。其中，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县域企业对政府“依赖性”的研究和竞争性县域政府的研究，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具有先进性。在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方面，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演进趋势，即封闭时期（1949～1978 年）县域政府单一驱动的结构；有限开放时期（1978～2001 年），县域居民和农户自从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一经产生，就在市场化机制作用下逐步被企业所整合并在企业的黏合下投入再生产过程，从而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企业和县域政府双轮驱动的结构；开放时期（2001 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逐步向市场决定的企业主导型驱动结构演进。有关不同时期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研究，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具有先进性，这为学术界深入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动力结构和动力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除了从动力主体角度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外，本书还从县域经济发展中诸生产要素的贡献度和县域经济增长引擎的贡献度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变迁规律，得出了诸多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例如，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贡献度呈现弱化趋势，而企业家、技术、人才、信息等先进要素则呈现强化趋势；投资、出口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驱动性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而消费的驱动性则呈现

弱化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直接以“三农”和县域为发展对象，引进先进生产要素，变革县域生产领域“劳动+土地”“土地+资本”等传统的、落后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城镇城市化和振兴乡村为重点，变革经济发展动能，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大引擎共同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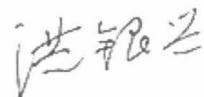
从实践的角度看，本书全面系统地证明了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内外源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和县域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本书重点求证了三个假说并最终得到了验证。一是由于县域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不可流动性或不可分割的特征，即使许多经济资源具有可流动性，但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县域面临的通常是经济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净流出，所以，依托当地资源并节约集约利用这些资源发展相关产业，是县域发展本地经济的必然选择。二是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子系统，县域空间范围的有限性，既决定了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增长性，也决定了县域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包容性，若仅仅依靠内源性发展并集约和节约利用这些资源，只能缓解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的矛盾，但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背景下，县域必须走内源性发展为主导并积极利用外源性发展的道路，将内源性发展之长与外源性发展之利有机结合起来。三是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县制、县域政府职能及其行为边界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县际发展差异巨大等国情和县情，决定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和发展模式，而必须在遵循县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找到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县域特点的发展之路，这也是我国许多不发达县域走向发达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上述三个结论是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不仅深入探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而且从致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县域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市场主体

在县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体系、消费与投资、出口协同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以及以内源性发展为主导并积极借用外力的政策体系，等等。这些政策建议有些是针对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有一些政策建议是从变革或创新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角度提出的，具有独到性、创新性。例如，为消除人力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尤其是不发达县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基础教育投入以省为主的体制机制；为变革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鼓励和支持人才向县域尤其是向农村流动，鼓励和支持适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向县域转移，创新资本尤其是风险资本支持农村发展的机制；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以及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鼓励和支持农户尤其是兼业农户的有序分化，大力培育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现代农户，稳步推进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尤其是职业农民的转变；为促成消费成为持续拉动县域经济的常态化引擎，鼓励和支持农村城镇的城市化建设、农民就地市民化，以及镇区、园区和社区“三区”协同建设；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竞争性县域政府注意力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变，即促进外源性动力的内源化，探寻内源式发展的新路径，创新内涵式增长的新思路，引导县域政府更加注重内功的提升，等等。这些政策建议既有全面、深入的学理分析，又有典型县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经验提炼，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而且对于深入研究我国的“三农”问题，也具有可借鉴性。

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非常高兴的是，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获得了“优秀”等级。这是评审专家们对项目研究成果质量的高度肯定。同时，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是对作者实践经历的一种肯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作者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企业一年时间的挂职锻炼和从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县（区）政府三年半时间的挂职锻炼，使其对中国国情、县域有了比其他学者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实践经历不仅有助于其更好地开展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而且为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特别是，丰富的实践阅历为其开展“实践—理论”范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实践经历和这种研究范式，正是当前我们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承担着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重任。要担当这一重任，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勇于到丰富多彩的中国实践中去，把社会当作大学校，把实践当作大课堂，在实践中创新理论，用创新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这样，才会产出更多的创新理论，这样的理论才会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和更大的影响力。



2017年11月22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 1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3
- 第三节 研究假设与研究视角 / 12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7
- 第五节 有可能的创新或特色 / 20
- 参考文献 / 22

第二章 县域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 24

- 第一节 县域经济范畴的解读 / 24
- 第二节 县域经济理论的基石 / 32
- 第三节 县域经济系统的运行 / 40
- 第四节 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 / 54
- 第五节 县域发展动力结构与变迁 / 61
- 参考文献 / 67

第三章 封闭条件下的动力结构 / 69

- 第一节 封闭条件及其县域经济运行 / 69
- 第二节 居民源动力及其动力链 / 75
- 第三节 农户主导型与分享型经营 / 84
- 第四节 有县域特点的内涵式发展与聚集经济 / 92
- 第五节 县域政府协整内外部资源的能力 / 101

第六节	单一封闭和双重封闭下的动力结构 / 111
参考文献	/ 117

第四章

有限开放条件下的动力结构 / 119

第一节	有限开放条件及其县域经济运行 / 119
第二节	居民驱动力的流动性及其效应 / 125
第三节	农户驱动力的裂变与凝聚 / 136
第四节	县域企业驱动力的聚散 / 147
第五节	竞争性县域政府的兴起 / 158
第六节	有限开放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 / 169
参考文献	/ 173

第五章

开放条件下的动力结构 / 175

第一节	开放条件及其县域经济运行 / 175
第二节	居民驱动力的生长与再极化 / 180
第三节	农户再分化及其驱动模式转型 / 185
第四节	企业耦合力及其驱动性升级 / 191
第五节	竞争性政府的极限及其角色校正 / 200
第六节	开放条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 / 212
参考文献	/ 219

第六章

县域经济主体驱动性的演进趋势 / 221

第一节	概论 / 221
第二节	经济变迁中县域居民驱动性的演进 / 222
第三节	经济变迁中农户驱动性的演进 / 229
第四节	经济变迁中县域企业驱动性的演进 / 234
第五节	经济变迁中县域政府驱动性的演进 / 238
参考文献	/ 242

第七章

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变迁规律 / 244

第一节	概论 / 244
第二节	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的基本描述 / 246
第三节	动力结构变迁规律的实证研究 / 251

第四节 动力结构变迁的经济学解释 / 258
第五节 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变迁的效应 / 270
参考文献 / 273

第八章 | 结论与启示 / 275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275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281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290
参考文献 / 293

后记 / 29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县是国家治理结构中最基础的行政单元，故有“郡县治，而天下无不治”之说。在春秋时代以前，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方式主要为分封制，春秋到战国时代逐步形成郡县制，秦统一六国后继承和发展了郡县制，秦以后的历代，除汉初、西晋、明初曾出现过分封制的回溯，但郡县制度这一基本制度结构一直延续至今。秦代以后的二千多年的历史证明，郡县制的产生，建立了“中央一郡一县”的国家治理结构，保证了政令畅通、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毛泽东讲“百代都行秦政法”，其中也肯定了秦始皇将郡县制设计为制度化结构所作的贡献。

县制的设立在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县制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性不仅是基于中央对基层单位的垂直控制，而且源于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有效组织、管理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保证。不过，在历史的变迁中，外患内忧也使得县制在组织、管理、发展经济方面的功能在多数朝代或时期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挥县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县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为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而“输血”，其“造血”功能（即促进县域自身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弱化了。由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与城市经济相比较，县域经济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只能属于传统的一元，即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经济结构层次偏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产效率不高，县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点和重点；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县域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生活环境不佳、生活方式相对落后，县域又成为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从建设和谐社会

角度看，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产业园区、城区的高速扩张，导致了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生态环境堪忧等矛盾或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频发性社会事件，县域成为各种矛盾的多发地，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

鉴于县域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瓶颈，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呼吁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绝大多数人的就业和收入问题。”^① 县域经济是“共和国的基石”，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陈剑波，2002；陈栋生，2004；张晓山，2007；孟宪江，2009）。中共中央也于2002年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命题。史料整理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县域的经济问题，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城镇化等。但是，中央将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还是首次。事实上，“县域的经济问题”与“县域经济”是两个概念，“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地理界限、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系统。研究县域经济，关键是要揭示这一系统的要素构成、内部结构、驱动机制和运行规律，而“县域的经济问题”只是县域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某个环节上的具体问题。因此，要解开“壮大县域经济”这一重大命题，不仅要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要从整体、系统、长远的角度探索县域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然而，梳理我国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人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县域经济具体问题及其对策，对于县域经济系统整体及其县域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基于以上背景和认识，本书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研究范式，以县域经济系统性特征为研究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范畴、理论和方法，从县域自身、县域之间、县域与中心城市之间三维角度，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进行总结、抽象和提炼，以揭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县域经济主体驱动经济的行为、特征、结构及其变迁规律，并从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促进县域经济动力结构有效演进的角度进行相应的政策体系设计。这一研究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

^① 陈锡文. 把发展县域经济摆上重要日程 [N]. 北京：经济日报，2001-10-31.

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经济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县域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加速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关于县域经济系统及其运行的研究，国外学术界直接可以借鉴的成果很少，但是，有关国别经济或区域经济等间接相关的研究，也可以为本书研究提供思想启迪、理论参考和方法论上的帮助。在国内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人们围绕县（区）域经济系统及其特征、县（区）域经济低水平均衡的原因、突破低水平均衡的路径和战略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可以为本书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县（区）域经济系统及其特征的研究

县域经济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经使用，胡福明的《中国县域经济学》和孙学文的《中国县经济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时，县域经济研究所涉及的大多是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而对县域经济本身涉及较少，甚至对什么是县域经济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在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县级经济、县区域经济、县经济等概念经常成为县域经济的代名词。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强调：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家政策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乡镇私营企业为载体。用现在的观点看，胡福明和孙学文有关县域经济的理论和观点有诸多商榷之处，但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他们提出县域经济问题并进行启蒙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同时为当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世纪之交，人们主要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认识县域经济。刘志澄、余汉新（1988）从系统论的角度讨论了县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王长远（1993）提出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县域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方面的各种运行机制构成的综合体。朱舜（1995）也认为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是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在县域内的有机结合。谢自奋、凌耀初（1996）认为县域经济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区域经济，而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并依靠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所凝聚的内在张力向外部区域扩展、渗透。张金山（1997）提出县域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特色型、不平衡发展的行政区域经济。厉以宁（2002）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基础层次的行政区域经济，且具有综合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刘福刚、孟宪江（2002）也认为，县域经济是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等等。这一阶段的学者们的核心研究成果是，认为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或“行政区域经济”，强调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的最大不同点是，前者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而后者是按照经济联系划分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后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县域经济作为一种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与按经济联系划分的区域经济相比较，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呈现出何种不同的特点及其规律？从逻辑上推论，人们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即将要提出这一问题，但最终并没有真正提出更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这一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大多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县域经济并对其特征进行描述。陈锡文（2001）把县域经济界定为一个复合的概念，即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互为支撑、三次产业互有包含、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并存的复合经济。王怀岳（2001）认为县域经济是县域的各个部门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一系列运行机制所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具有开放性、区域特色性和空间非均衡性等特征。李小三、徐鸣（2000）认为，县域经济是以中国的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镇、乡、村各层次经济要素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王盛章、赵桂溟（2002）提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和区域经济网络，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等特征。陈清（2004）立足于国民经济大系统，认为县域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变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县级行政区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细胞。刘俊杰（2005）从县域经济运行空间角度界定县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县为空间运行场域的空间经济体，它的内涵涵盖“行政区经济”和“市场区经济”，具有复合经济空间的特点。闫恩虎（2005）则强调县域经济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系统，是行政性区域经济的概念，在